

丁
东

冬夜长考

冬夜长考

丁
东



书边草丛书
冬夜长考
丁东 著

*

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政编码:300020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市津美胶印厂印刷

*

850×1092毫米 32开 6.5印张 4插页 117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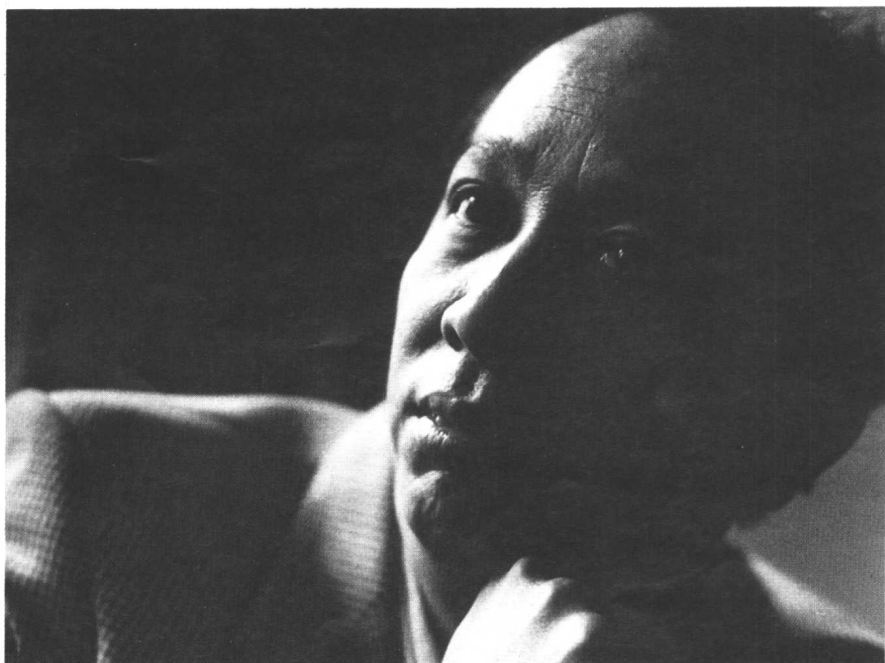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

ISBN 7-5309-2552-0

I·86 定价:9.80元



丁东, 1951年生, 在黄浦江畔, 不满周岁去了北京。小学、初中就读于和平门外师大附属的两所老学校。上山下乡的大潮把他推上了太行山, 在一个名叫长胜的村子里种了三年地。以后进了省城机关, 当了几年小干部, 干上了“政策研究”。1977年参加高考, 次年春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当时并不喜欢历史, 而是热衷于文学。以后到山西社会科学院, 也是做文学理论编辑, 写文艺批评文章。直到90年代, 兴趣才回到历史, 尤其是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 这大概是文变染乎世情吧。

总序

于纷繁万象、嘈杂人生之中，眼下读书又成为一种景观，或者说是一种热潮，总是件好事。但在物欲膨胀、知识贬值、文化沙化、书籍也可以制作得花里胡哨犹如时髦服装的当今，读书和出版读书之类的书籍，也可以成为一种流行的时髦。

我们编的这一套“书边草”读书丛书，不想追逐这种时髦。

我们期冀作者读书理书、书林掇英、笔底钩沉之中，让心和着书页一起跳动，让书有着灵动的生命气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因书的生命而滋养得以扩充和延长。

我们期冀读者读到的不是浮文弱质、花拳绣腿、时令果蔬般的书话文章，而能心有所动、思有所悟，或荡心涤虑，或洗心静气，或清心清火，或会心会意。

我们同时期冀与其他出版的读书书籍有所不同，拥有着自己一份与众不同的特色。这一份特色主要表现在不是惯常见到的那种五色杂陈读书文章的汇集，而是每一本书集中一个领域

和主题，决无思有旁鹜、斜枝横倚；不求五光十色，但求心系一处。

“书边草”丛书第一辑五册，特意约请五位中青年作家，或心游万仞纵横中国现代文人的文脉心曲；或取心析骨解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的荣枯得失；或怀珠韞玉涉猎外国文学家的爱恨大潮；或朝花夕拾聆听西方古典音乐的华彩乐章；或探本溯源追踪世界流行歌坛的波动轨迹……五位作家对各自的领域和主题都有各自多年的关注和研究，因此，五本书不是一时的即兴之作，而是多年读书的结晶。

读书，难能暴饮暴食，长期的积累，悄悄的消化，与书为友，身心相伴，白雪红炉、黄卷青灯、绿茗紫烟中，一次次默默的交融和心神之间的对话，方才能使得读书的心得落花流水，蔚为文章；方才能使得读书的文章积沙成塔，聚腋成裘，集成各自一束小书，共五册奉献在读者的面前。虽各成一体，独立成行，且写法各异，样式不拘，或疑或怨、或激或愤，或探颐索隐、或钩深致远……却都是融评于书，寄情于思。五册书集中一起，可形成如篮球场上的一支队伍般的阵势，腾挪跳跃，攻防交叉，姿态互补，色彩纷呈；多几分活泼，也多几分相互的呼应和交融。

读书的文章，有了情趣，不是那么正襟危坐、学究气十足，人云亦云，或自视清高用来唬人的行当。读书，便也成了你我可以共同拥有的

一种境界。

的确，读书不是去游览胜地，满足于我们的观光；读书不是逛超级市场，满足于我们的物欲。读书，是寻找一块洁净的宿营地，能安置我们的灵魂；是寻找一方明亮清澈的夜空，让我们的梦能毫无顾忌地尽情飞翔。

过去常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其实，书中有的是我们的心和精神。我们能够拥有的一切，不是要向书中去索取什么，而是要向书中掏出我们内心里的一些什么。应该说，“书边草”第一辑五册书，是向书中，也是向读者掏出了一些作者内心世界真诚的思考、疑问、发现和收获。这就使得这套丛书不仅具有自己的特点，给予读者不同侧面的知识，而且具有了一定的向书同时也是向这个世界向自己叩问的带有心问和天问式的深度，以及温馨而湿润的气息。那气息，来自书中，更来自心灵。

希望读者读到这套丛书不会失望，而会喜欢。也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我们将继续把“书边草”丛书的下一辑编下去。我们希望“书边草”的草丛丰富茂盛。

我们希望更多的读者和作者走进这片清新湿润的书丛。

目 录

总序 肖复兴

从五本书看一代学人 //1

一代文豪的晚年与晚节 //22

走近王国维 //28

透视周作人 //34

沙叶新的谜语 //39

重温四十年前的

一次学术批判 //45

肇庆寻思

——关于张闻天 //49

拔地苍松有远声

——关于王元化、李慎之 //51

想起了余易木 //54

夏访“听风楼” //56

三不老一号的故事 //60

不仅仅是争鸣

——王蒙现象 //65

失传的风骨 //68

从科学尊严到人类良知 //71

从四本书看九十年代

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 //79

再谈四本关于

知识分子的书 //91

研究顾准的意义所在 //104

回应顾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

深层漩流 //109

告别御用的悲剧 //115

文革时期民间思想的

初步梳理 //120

寻访失踪的思想者 //134

黄皮书 灰皮书 //143

一代人的梦与醒 //146

春的思绪 冬的现实 //155

思想的吸引力 //160

思想传媒与文化走势 //165

书评的独立性 //171

舆论的尴尬 //174

“红卫兵思维”辨析 //177

呼唤理想与反抗媚俗 //181

学术规范化随想 //184

九十年代中国

文化走向初描 //190

后记 //195

从五本书看一代学人

近几年，反思中国近现代学人的历程逐渐成为显学。不但治思想史、学术史者投入此道，连前些年文学界的不少思想活跃者，也把注意力转到这一领域。这种转移，与其说是逃避现实，不如说是从更深的层次上关注现实。昨天的学人是今天学人的镜子，反思老一代学人的文品与人品，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探寻今后中国知识分子应当追求什么样的文品与人品。怀着这样的心情，我最近集中阅读了五本关于出生在上世纪末的知识分子的书，即《郭沫若书信集》（黄淳浩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蔡仲德编，河南人民出版社）、《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梁漱溟问答录》（汪东林编，湖南出版社）、《我的哲学“罪案”》（杨献珍著，人民出版社）。这五本书，风格不同，体裁各异，但互相比较，令人感慨万千。



第一本书：《郭沫若书信集》

研究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回避郭沫若。鲁迅死后，郭沫若成为左翼文化旗手。解放后，他一直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位居科学、艺术两界首席，并一直兼任国家要职。毫无疑问，郭沫若是建国后中国知识界主流的代表。郭沫若在科学和艺术上都是勤奋的，他并没有因身居高位而松懈著述，已经有许多传记、论文、回忆文章对郭老作了充分的赞扬，我无须重复这方面的意见。

我想探讨的是，在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漫长的炼狱中，郭沫若到底拥有怎样一种心境？本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中度过的。除“文革”那一场运动对郭老有所伤害而外，郭沫若一直充当革命动力。一方面，他率先对诸如胡适派、胡风集团、右派分子等革命对象声讨、批判；一方面，他对毛泽东歌功颂德，那些白纸黑字已经很难经受历史的检验，有些明显的过头话甚至成为笑柄。比如，王元化谈到郭沫若有一篇名为《红旗跃过汀江》的文章，其中说：“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梁’写作‘黄粱’，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



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王元化评论道:“这话又说得何其肉麻!”的确如此。

我无意嘲笑郭老。明眼人一看即知,郭老晚年表面上地位显赫,实际上并无尊严。否则,年轻时曾经呼唤凤凰在烈火中再生,到暮年何必如此阿谀?

我只是想找到一个通向 he 内心世界的窗口。

这个窗口出现了,这就是 90 年代发现的一批他写给陈明远的信。

郭沫若一生中,通信的对象可谓多矣,黄淳浩编的这两卷《郭沫若书信集》,涉及的郭氏通信对象就逾百人,但通读之后,感到只有写给陈明远的信最为特殊,堪称摘下面具,口吐真言。以下试举几例。

1963 年 11 月 14 日的信中说:“来信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我跟你有同感。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你的文章,是否先放在我处保存起来,不要急于发表。凡事要先冷静地看一看再说。有时候,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可能招来



不必要的麻烦。”陈明远当时 22 岁，他给郭的信里说了什么，我们无从知道，但可以推测，议论的是“大跃进”一类国事。郭老一是认同他的看法，二是替他担心。须知，大跃进中，郭曾与周扬合编《红旗歌谣》，也算为大跃进添柴加薪。但他真实的看法，竟与彭德怀相近！

1965 年 9 月 20 日的信中说：“在我看来，批评有每个人的自由。你说得很对：一切都要实事求是，对于别人要实事求是，对自己更必须始终要实事求是！但你太年轻，太天真，目前你把世界上的事物看得过于单纯了。现在哪里谈得上开诚布公。两面三刀、落井下石，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甚至不惜卖友求荣者，大有人在。我看不必跟那些无聊无耻的文人去纠缠了。因此，我劝你千万不要去写什么反驳的文章，那不是什么‘学术讨论’，你千万不要上当！”把学术讨论搞成知识分子萁豆相煎，几乎成为当时学术界的通例。在多次所谓的“学术讨论”、“引蛇出洞”中，郭老唱的都是红脸。不看这一番私语，会以为他真是像胜利的将军一样洋洋自得。其实，他心里并不以为然！

1963 年 5 月 5 日的信中说：“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



小就敢对我说真话，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这是他的自知之明。郭老毕竟是史学家，明之视今，如同今之视昔。所以，他连后人对他的耻笑都预料到了。

1965年12月22日的信中说：“我早已有意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上月我满七十三周岁了。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在世的日子，所剩无几了。回顾这一生，真是惭愧！诗歌、戏剧、小说、历史、考古、翻译……什么都搞了一些，什么都没有搞到家。好像十个手指伸开按跳蚤，结果一个都没能抓着。建国以后，行政事务缠身，大小会议、送往迎来，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近年来总是觉着疲倦。……我说过早已厌于应酬、只求清静的话，指的是不乐意与那帮无聊之辈交往。至于你，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我的房门永远对你敞开着的。”这封信写于文革前夕，郭老还未受冲击，心境却已十分悲凉。

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郭沫若只对陈明远一个人口吐真言？我想，原因应当从两方面找。在郭老方面，“高处不胜寒”，周围有公务关系的，很难成为交心者。他要是真的在周围营造一个说真话的气氛，早就殃及自身了。郭老也知道自己穿的是“皇帝的新衣”，而别人不管是出于需要，还是碍于无知，都争着



夸他的衣服漂亮；只有陈明远，从孩提时代就与他相识，进入青年，有了批判能力，仍然“童言无忌”，敢于戳破真相。郭沫若也是人，虚伪的氛围也使他感到窒息。于是，陈明远这个忘年交，成了郭沫若呼吸新鲜空气的唯一窗口。

自古以来，文人由士而仕，都难免以出让自我为代价。明代海瑞就说：“一仕于人，则制于人，制于人则不得以自由。制于人而望于人者，惟禄焉。”郭老的悲剧在于，他不是没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无力自拔。文革中，其子被抓，危在旦夕。夫人于立群让他在当晚的宴会上向周恩来求救，他竟未能发一言，不几日，儿子便命归黄泉。他内心世界其实极为痛苦，而他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又加剧着这种痛苦。给陈明远的那些信，不过是他内心世界的巨大冰山所露出的一个尖顶，但其余部分也许永远无法浮出海面。

第二本书：《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

冯友兰先生逝世于1990年底。当时，季羨林先生发表文章，题为《大节不亏，晚节善终》，这个评价颇有余味。后来，季先生这篇文章应冯氏亲属要求，题目改为《生命不息，睿思不止》，但我还是想从原来的题目说起。

冯友兰前半生以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享誉中



外，后半生在不断地接受批判和不断地自我检讨中度过，70年代不意成为批孔“明星”，但冯先生在晚年，威信节节上升，去世之后，回忆、纪念冯先生的文章纷纷扬扬，并且都饱含真挚的敬重之情。这固然因为冯先生的学问大、弟子多，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晚年的道德文章。然而，冯先生“晚年善终”的具体表现，大多数文章语焉不详，这对于置身局外的一般读者来说，就成了一个谜。

最近，蔡仲德著《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出版，可谓解开此谜的一把钥匙。年谱记载，冯先生耄耋之年，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尤其是第七卷，更是充分体现了他如何恢复失去多年的独立批判精神。冯先生说：“在写本册第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了。在写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并且对朋友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

正如冯先生所料，第七卷至今也未能在大陆出版。无论是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还是河南人民出版社的《三松堂全集》，都不成完璧。之所以遇到麻烦，无非是因为冯先生对毛泽东后期思想作了研究，提出“毛泽东思想发展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等新观点。冯之观点是耶非耶，尚可讨论。可贵的